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 新 孙思白 主编

中华书局

民国人物传

卷之三

（1926—1936）

（1926—1936）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

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新 孙思白主编

中华书局

1978年·北京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 国 人 物 传

(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新 孙思白主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13 印张 265 千字

1978 年 8 月第 1 版 197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制

统一书号：11018·751 定价：1.00 元

前　　言

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接受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当即召开座谈会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初步设想：

一、编写《中华民国史》，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绝不能因袭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修史方法。

二、写一部书，定名为《中华民国史》，拟分三编：

第一编 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

第二编 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1912—1927年)

第三编 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927—1949年)

三、编三种资料：

第一种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二种 《中华民国人物志》

第三种 《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四千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

如何写传记，我们毫无经验，只预先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一个人写传记，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个人的一生有了总的概念、对他的主要言行有了具体的判断，并且自信这个概念和这些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然后才可以下笔。

二、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通过具体的事例把正确的观点表现出来。不要离开事实材料，作过多的评论。对事实的取舍、详略以至措辞用字，都必须仔细斟酌，力求妥贴。

三、要求真实可信。传记中所写的事情，要经过反复核对，有的还要经过调查研究，力求做到确实无误。凡是有疑问而又查不清的，宁可不写或存疑，不要以讹传讹。

四、要求在反映一个人的全貌的同时又要有重点与特点。一个人的传记，要把他的家庭情况、上学情况、主要的经历和言行，总而言之，要把他的生平事迹如实地反映出来。但又不要写成流水帐或年谱。要把最能反映本质的事情，选其中最重要的一两件写得详细、生动些，其余的不妨简略。

五、要求用白话文写，文字要力求简练。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引文，引文要注明出处。每篇以二、三千字为准，不要写得太长。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非全国大协作不能成功。即以写人物传记而论，那个行业的人由那个行业的人来写最好，那个地方的人由那个地方的人来写最好。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希望这批初稿，能引起各方面和全国各地方的兴趣，大家都来写，尤其是

熟悉情况的人动手写，那么《中华民国史》就不难完成了。我们还希望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不但自己动手写，而且要把有关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承担起来。

目 录

孙中山	尚明轩	(5)
黄 兴	周天度	(35)
宋教仁	周天度	(43)
陈天华	周天度	(48)
秋 瑾	闻少华	(52)
徐锡麟	闻少华	(58)
朱执信	尚明轩	(62)
熊成基	黄德昭	(68)
焦达峰	周天度	(72)
张培爵	沈庆生	(76)
禹之谟	闻少华	(81)
喻培伦	尚明轩	(85)
林述庆	王学庄	(89)
蔡 钔	张振鹤	(93)
伍廷芳	郑则民	(101)
陈其美	黄德昭	(105)
邓演达	傅洪奎 周天度	(111)
杨虎城	黄德昭	(119)

唐绍仪	郑则民	(126)
胡汉民	周天度	(131)
黄 郭	郑则民	(140)
袁世凯	李宗一	(145)
徐世昌	李宗一	(156)
段祺瑞	李宗一	(162)
曹 锰	张振鹤	(172)
张作霖	黎 光 孙继武	(179)
陆荣廷	李宗一	(190)
李 纯	张振鹤	(198)
徐树铮	李宗一	(204)
孙传芳	张振鹤	(208)
张 勋	李宗一	(215)
梁士诒	郑则民	(221)
陆征祥	郑则民	(227)
曹汝霖	郑则民	(231)
张宗昌	黄德昭	(236)
韩复榘	沈庆生	(243)
石友三	沈庆生	(248)
秦德纯	沈庆生	(253)
张 肇	朱信泉	(259)
徐 润	江绍贞	(266)

穆藕初	朱信泉 (270)
吴蕴初	朱信泉 (274)
荣宗敬、荣德生	江绍贞 (278)
郭 乐	江绍贞 (285)
夏瑞芳	熊尚厚 (291)
宋则久	熊尚厚 (295)
简照南、简玉阶	熊尚厚 (298)
严裕棠	熊尚厚 (304)
杨粲三	熊尚厚 (309)
杜月笙	江绍贞 (314)
康有为	耿云志 (320)
△蔡元培	宗志文 (328)
邵飘萍	耿云志 (335)
陶行知	宗志文 (342)
朱自清	娄献阁 (349)
史量才	耿云志 (356)
马相伯	娄献阁 (360)
王国维	耿云志 (366)
丁文江	耿云志 (370)
邹 鲁	闻少华 (377)
刘师培	朱信泉 (382)
罗振玉	耿云志 (387)
江亢虎	曾业英 (391)
田耕莘	雷镇阁 (399)

余日章 雷镇阁 (402)

附录:《中华民国人物志》中的《民国人物传》
选录草案 (405)

孙 中 山

尚明轩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因此以后又号中山。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其时中国正处于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当鞋匠，后归家务农。哥哥孙眉，1871年到檀香山作雇工，后经营畜牧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

孙中山六岁起在家参加农业劳动，十岁进塾读书。他的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非常向往。1878年，他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家里，先后进英、美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及奥阿厚书院读书，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1883年返回家乡，目睹清吏腐败，深感不满，常加批评。因毁村庙偶像，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同年冬往香港。1884年到1885年间，先入拔萃书室、后转域多利书院读书。

1885年，中法战争以清政府向法国侵略者屈服而告终。孙中山怵于民族灾难的深重，产生了从事改造国家的念头。他打算“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①便于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学医。在这里，他结识了

同学中的会党人物郑士良，以后在革命过程中运动会党起事，得郑助力甚多。第二年秋，他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到1892年毕业。在校五年，他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与先后结识的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等人，志趣相同，经常聚谈，倡言革命。其中和陈、杨、尤三人同住香港，交游尤密。当时革命尚未兴起，人们听到他们的革命性言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把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

孙中山结束学生生活后，从1892年起，先后在澳门、广州开设西医房，借行医为掩护，积极结识一些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当时，改良主义思潮正在国内盛行，孙中山及其同志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对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存有若干幻想。早在1889年，他就曾致书已退职的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过效法西方国家以进行改良的具体意见，建议先在香山倡行，然后推广全国各地。^② 1894年6月，他又约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③的变法自强的主张。李鸿章对他的投书没有理睬。

通过事实的教育，孙中山觉悟到上书言事的“和平之法，无可复施”^④，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救中国。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起，清政府在战争中接连遭到失败，孙中山更感到国家民族的危机严重，便决定赴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11月，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经孙中山倡议，在檀岛成立。《兴中会章程》中

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进而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⑤入会者必须宣誓。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⑥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合同志，于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成立兴中会总部，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不久，大家商议袭取广州的计划。其时，清政府刚与日本缔结了《马关条约》，全国人民对于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无不痛心疾首。于是他们加紧筹备，商定由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入广州主持发动，由杨衢云、黄咏商等留港接应，并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夏历九月初九日）举行起义。经过半年的筹备，广东省各地的会党、绿林和防军，均已联络成功，不料在起义前两日，正当运械赴广州时，事泄失败。陆皓东等被捕遇害。孙中山逃亡日本。这是孙中山武装起义的第一次失败。

孙中山在日本联络华侨，11月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他断发辫，改服装，以示革命决心。之后，再往檀岛。时当新败，不易开展工作，于是在1896年6月又赴美国联络华侨。但当时美洲华侨，风气闭塞，愿赞助革命的不多；与洪门会会员有所接洽，也收效不大，遂决定渡海往英国。10月1日他到达伦敦，首先访问了他学医时的老师英人康德黎（J. Cantlie），并在康寓附近住下来。10月11日，孙中山在外出途中被清

政府驻英公使诱骗绑架，羁囚在使馆里。使馆人员准备把他偷运回国杀害；幸得康德黎等多方设法，积极营救，才于十二天后脱险。此后一年，他留住伦敦，每天到图书馆中努力钻研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理论书籍，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求救国真理。这时期，孙中山由于接触到些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加以目睹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政府军队残酷镇压的情景，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用民生主义来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

孙中山不愿久留欧洲，远离中国，旷废革命时日，遂于1897年秋，重到日本；并结识了日本朝野的许多人物，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或赞助。1898年9、10月间，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因变法失败，亡命日本。由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居间联络，劝说孙中山等和他们谈判合作。于是，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人要他们“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⑦由于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的顽固立场，谈判不得结果。^⑧1899年夏秋间，孙中山又与梁启超等在横滨继续就合作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因康有为强烈反对，梁启超口是心非，联合的计划终未实现。此后，孙中山逐渐识破了康有为保皇派的反动面目，并认为他是个“坏透了的孔学家是一文不值的”。^⑨

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一带，清政府于6月对外“宣战”。当时英国政府为镇压中国人民，与沙俄对抗，并“保护”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侵略利益，拉拢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动“东南互保”；又策动粤督李鸿章据两广“自主”。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在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授意下，与

陈少白秘商，拟请孙中山帮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李鸿章幕中要人刘学询函邀孙中山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得讯后，开始有些犹豫，随后决定：一面仍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一面偕杨衢云、宫崎寅藏等赴广州同李鸿章商谈“合作”。他抵香港后，得知李鸿章尚在观望形势，看风转舵；且有企图诱捕自己的阴谋；便拒绝前往广州，乘原船赴越南再转香港。7月，孙中山仍拟借英国力量推翻清朝，在南方成立“独立”政府^⑩，来实现他救国的目的。这些活动，表明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中“洋务派”的幻想还没有完全破灭。

孙中山在日本准备再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对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早在1898年和菲律宾人民起义军派到日本的代表彭西（Mariano Ponce）有过接触，并应其所请，积极帮助。1899年，他为他们购买和运送了一批军械，并准备亲率杨衢云等赴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1900年1月，他再次设法为他们购置了一批枪械。这种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在旅日的亚洲各国革命人士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同年10月，孙中山又组织了惠州起义。这次起义是郑士良等奉孙中山之命进行的。惠州起义军一度发展到二万多人，血战逾半月，但最后终于失败。

1901年至1904年，孙中山远涉重洋为革命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1902年冬到越南，1903年秋又从日本往檀香山，1904年春再去美洲，至年底又由美洲到了欧洲。这次所到之处，与从前大不相同，华侨与留学生中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地多起来了。因为自《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民

族危机更加严重，清政府威信扫地，人民的不满迅速增长。同时，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增强。不少地方蓬勃地开展抵制美货及收回铁路矿权的运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掀起抗捐抗税的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日益倾向革命。国内外各地继兴中会之后，又陆续涌现了一些革命团体。如 1902 年留日学生组织的青年会，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1903 年留日学生成立的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1904 年湖南组成的华兴会、武昌组成的科学补习所、上海组成的光复会，1905 年上半年湖北创立的日知会等等。与此同时，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各种报刊书籍也纷纷出现，促进着人们的觉醒，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时，中国已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

但是，从 1898 年秋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念念不忘他们的“圣主”，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又于 1899 年 7 月以后，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保皇会，反对和破坏革命。同年 12 月，狡猾的梁启超忽然伪装愿与孙中山合作，骗取了孙中山给孙眉等兴中会员的介绍信，持赴檀岛，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⑪的谎言，混淆视听，诱骗华侨加入保皇会。兴中会发源地的檀岛，会员被夺去大半。海外其他各埠兴中会员，也受他们的迷惑，不少转入保皇会，为康、梁所利用。1902 年 2 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又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他惯于在字里行间玩弄些“革命”的词藻，用来蛊惑群众。这一套骗人伎俩，逐渐地为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所识破。早在 1900 年，孙中山对梁启超上年在檀岛招摇撞骗的无耻行径已给以严厉的